

WOHE
SHI

我和诗

杨匡汉 刘福春 编



花城出版社

我和诗

杨匡汉 刘福春 编

花城出版社

我 和 诗

杨匡汉 刘福春 编

*

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 东 省 新 闻 司 发 行
七 二 一 五 工 厂 印 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插页 139,000字

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7,500册

书号 10261·238 定价0.71元

目 录

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	胡 适 (1)
《猛虎集》序文	徐志摩 (19)
诗问答	李金发 (25)
我的作诗的经过	郭沫若 (29)
我和诗	宗白华 (42)
我怎样写诗的?	艾 青 (49)
我的诗生活 (节选)	臧克家 (58)
我的诗道路	王亚平 (93)
写诗的经过	何其芳 (103)
写在《给战斗者》的末页	田 间 (139)
在学习写诗的道路上	公 刘 (152)
布谷鸟的歌唱	邹荻帆 (174)
自序	李 瑛 (181)
我是怎样写起诗来的	苏金伞 (195)
诗缘	张志民 (201)
我与诗	萧 三 (212)
编后	(218)

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

(《尝试集》自序)

胡 适

我这三年以来做的白话诗若干首，分做两集总名为《尝试集》，民国六年九月我到北京以前的诗为第一集，以后的诗为第二集。民国五年七月以前，我在美国做的文言诗词删剩若干首，合为《去国集》，印在后面作一个附录。

我的朋友钱玄同曾替《尝试集》做了一篇长序，把应该用白话做文章的道理说得很痛快透切（见《新青年》四卷第二号）。我现在自己作序，只说我为什么要用白话来做诗。这一段故事，可以算是《尝试集》产生的历史，可以算是我个人主张文学革命的小史。

我做白话文字，起于民国纪元前六年（丙午），那时我替上海《竞业旬报》做了半部章回小说和一些论文，都是用白话做的。到了第二年（丁未），我因脚气病，出学堂养病。病中无事，我天天读古诗，从苏武、李陵直到元好问，单读古体诗，不读律诗。那一年我也做了几篇诗，内中有一篇五百六十字的《游万国赛珍会》，和一篇近三百字的《弃父行》，

以后我常常做诗，到我往美国时，已做了两百多首诗了。我先前不做律诗，因为我少时不曾学对对子，心里总觉得律诗难做。后来偶然做了一些律诗，觉得律诗原来是最容易做的玩意儿，用来说应酬朋友的诗，再方便也没有了。我初做诗，人都说我象白居易一派。后来我因为要学时髦，也做一番研究杜甫的工夫。但是我读杜诗，只读《石壕吏》、《自京赴奉先咏怀》一类的诗。律诗中五律我极爱读，七律中最讨厌《秋兴》一类的诗，常说这些诗文法不通，只有一点空架子。

自民国前六七年到民国前二年（庚戌），可算是一个时代。这个时代已有不满意于当时旧文学的趋向了。我近来在一本旧笔记里（名《自胜生随笔》，是丁未年记的）翻出这几条论诗的话：

作诗必使老妪听解，固不可。然必使士大夫读而不能解亦何故耶？（《录麓堂诗话》）

东坡云，“诗须有为而作。”元遗山云，“纵横正有凌云笔，俯仰随人亦可怜。”（《录南濠诗话》）

这两条上都有密圈，也可见我十六岁时论诗的旨趣了。

民国前二年，我往美国留学。初去的两年，作诗不过两首。民国成立后，任叔永（鸿隽）、杨杏佛（铨）同来绮色佳（Ithaca），有了做诗的伴当了。《集中文学》篇所说：

明年任与杨，远道来就我。山城风雪夜，枯坐殊未

可。

烹茶更赋诗，有倡还须和。诗炉久灰冷，从此生新火。

都是实在情形。在绮色佳五年，我虽不专治文学，但也颇读了一些西方文学书籍，无形之中，总受了不少的影响，所以我那几年的诗，胆子已大得多。《去国集》里的《耶稣圣诞节歌》和《久雪后大风作歌》都带有试验意味。后来做《自杀篇》，完全用分段作法，试验的态度更明显了。《藏晖室札记》第三册有跋《自杀篇》一段，说：

……吾国作诗每不重言外之意，故说理之作极少。求一朴蒲（Pope）已不可多得，何况华茨活（Words worsh）贵推（Goethe）与白朗吟（Browning）矣。此篇以吾所持乐观主义入诗。全篇为说理之作，虽不能佳，然途径具在。他日多作之，或有进境耳。（民国三年七月七日）

又跋云：

吾近来作诗，颇能不依人蹊径，亦不专学一家。命意固无从摹仿，即字句形式亦不为古人成法所拘，盖颇能独立矣。（七月八日）

民国四年八月，我作一文论“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”。文中列举方法几条，还不曾主张用白话代文言。但那时我已明言“文言是半死之文字，不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。”又说：“活文字者，日用语言之文字，如英法文是也，如吾国之白话是也。死文字者，如希腊拉丁，非日用之语言，已

陈死矣。半死文字者，以其中尚有日用之分子在也。如犬字是已死之字，狗字是活字，乘马是死语，骑马是活语；故曰半死文字也。”（《札记第九册》）

四年九月十七夜，我因为自己要到纽约进哥伦比亚大学，梅觐庄（光迪）要到康桥进哈佛大学，故作一首长诗送觐庄。诗中有一段说：

梅君梅君毋自鄙！神州文学久枯馁，百年未有健者起，
新潮之来不可止，文学革命其时矣！吾辈势不容坐视，且复号召二三子，革命军前杖马鎗，鞭笞驱除一车鬼，再拜迎入新世纪！以此报国未云菲，缩地哉天差可儻。梅君梅君毋自鄙！

原诗共四百二十字，全篇用了十一个外国字的译音。不料这十一个外国字就惹出了几年的笔战！任叔永把这些外国字连缀起来，做了一首游戏诗送我：

牛敦，爱迭孙，培根、客尔文，索虏与霍桑，“烟士披里纯”：

鞭笞一车鬼，为君生琼英。文学今革命，作歌送胡生。

我接到这诗，在火车上依韵和了一首，寄给叔永诸人：

诗国革命何自始？要须作诗如作文，琢镂粉饰丧元气，
貌似未必诗之纯。

小人行文颇大胆，诸公一一皆人英，愿共僇力莫相笑，
我辈不作腐儒生。

梅觐庄误会我“作诗如作文”的意思，写信来辩论。他说：

……诗文截然两途。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，自有诗文以来，无论中西，已分道而驰。……足下为诗界革命家，改良诗之文字则可；若仅移文之文字于诗，即谓之革命，谓之改良，则不可也。……以其太易易也。

这封信逼我把诗界革命的方法表示出来。我的答书不曾留稿，今钞答叔永书一段如下：

适以为今日欲救旧文学之弊，先从涤除“文胜”之弊入手。今人之诗徒有铿锵之韵，貌似之辞耳。其中实无物可言。其病根在于重形式而去精神，在于以文胜质。诗界革命当从三事入手：第一，须言之有物；第二，须讲求文法；第三，当用“文之文字”时，不可故意避之。三者皆以质救文之弊也。……覩庄所论“诗之文字”与“文之文字”之别，亦不尽当。即如白香山诗“城云臣按六典书，任土贡有不贡无，道州水土所生者，只有矮民无矮奴！”李义山诗，“公之斯文若元气，先时已入人肝脾。”……此诸例所用文字，是“诗之文字”乎？抑“文之文字”乎？又如适赠足下诗，“国事今成遍体疮，治头治脚俱所急”。此中字皆覩庄所谓“文之文字”。……可知“诗之文字”原不异“文之文字”；正如诗之文法原不异文之文法也。……（五年二月二日）

“诗之文字”一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问题，因为有许多人只认风花雪月，蛾眉，朱颜，银汉，玉容等字是“诗之文

字”，做成的诗读起来字字是诗！仔细分析起来，一点意思也没有。所以我主张用朴实无华的白描工夫，如白居易的道州民，如黄庭坚的《题莲华寺》，如杜甫的《自京赴奉先咏怀》。这类的诗，诗味在骨子里，在质不在文。没有骨子的滥调，诗人决不能做这类的诗。所以我的第一条件便是“言之有物”。因为注重之点在言中的“物”，故不同所用的文字是诗的文字还是文的文字。覩庄认做“仅移文之文字于诗”，所以错了。

这一次的争论是民国四年到五年春间的事。那时影响我个人最大的，就是我平常所说的“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”，这个观念是我的文学革命论的基本理论。《札记》第十册有五年四月五日夜所记一段如下：

文学革命，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。即以韵文而论，三百篇变而为骚，一大革命也。又变为五言七言，二大革命也。赋变而为无韵之骈文，古诗变而为律诗，三大革命也。诗之变而为词，四大革命也。词之变而为曲，为剧本，五大革命也。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？文亦遭几许革命矣。自孔子至于秦汉，中国文体始臻完备。六朝之文……亦有可观者。然其时骈俪之体大盛，文以工巧雕琢见长，文法遂衰。韩退之所以称“文起八代之衰”者，其功在于恢复散文，讲求文法。此一革命也。……宋人谈哲理者，深悟古文之不适用于用，于是语录体兴焉。语录体者，禅门所常用，以俚语说理纪言。……此亦一大革命也。至元

人之小说，此体始臻极盛。……总之文学革命至元代而极盛。其时之词也，曲也，剧本也，小说也，皆第一流之文学，而皆以俚语为之。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“活文学”出现。倘此革命潮流（革命潮流，即天演进化之迹。自其异者言之，谓之革命；自其循序渐进之迹言之，即谓之进化可也。）不遭明代八股之劫，不遭前后七子复古之劫，则吾国之文学已成俚语的文学，而吾国之语言早成为言文一致之语言，可无疑也。但丁之创意大利文学，却叟辈之创英文学，路得之创德文学，未足独有千古矣。惜乎，五百余年来，半死之古文，半死之诗词，复夺此“活文学”之席，而“半死文学”遂苟延残喘以至于今日。……文学革命何可更缓耶！何可更缓耶！

过了几天，我填了一首《沁园春》词，题目就叫做“誓诗”，其实是一篇文学革命宣言书：

更不伤春，更不悲秋，以此誓诗。任花开也好，花飞也好；月圆固好，日落何悲！我闻之曰，“从天而颂，孰与制天而用之？”更安用，为苍天歌哭，作彼奴为！

文章革命何疑！且准备搴旗作健儿。要前空千古，下开百世，收他臭腐，还我神奇！为大中华，造新文学，此业吾曹欲让谁？诗材料，有簇新世界，供我驱驰！
（四月十三日）

这首词上半所攻击的是中国文学“无病而呻”的恶习惯。我

是主张乐观，主张进取的人，故极力攻击这种卑弱的根性。

下半首是《去国集》的尾声，是《尝试集》的先声。

以下要说发生《尝试集》的近因了。

五年七月十二日，任叔永寄我一首《泛湖即事诗》。这首又惹起一场大笔墨官司，故不能不钞一段于此：

荡荡平湖，漪漪绿波。言棹轻楫，以涤烦疴。既备我糇，既偕我友，容与中流，山光前后。……清风竟爽，微云蔽喧；猜谜赌胜，载笑载言。行行忘远，息楫崖根。忽逢波怒，鼈掣鲸奔！岸逼流回，石斜浪翻！翩翩一叶，冯夷所吞。舟则可弃，水则可揭，湿我裳衣。畏他人视。……

我答书说：

……泛湖诗中写翻船一段所用字句，皆前人用以写江海大风浪之套语。足下避自己铸词之难，而趋于借用陈语套语之易。足下自谓“用力太过”，实则全未用气力。趋易避难，非不用气力而何？……再者，诗中所用“言”字，（第三句）及“载”字，皆系死字。又如“猜谜赌胜，载笑载言”两句，上句为二十世纪之活句，下句为三千年前之死句，殊不相称也。……

（七月十六日）

叔永答书，把原诗极力删改一遍，远胜原稿了。不料我这几句话触怒了一位旁观的朋友。那时梅艷庄在绮色佳过夏，见了我这些话，因写信来痛驳我。他说：

足下所自称文学革命真谛者，不外乎用“活字”以

入文；于叔永诗中，稍古之字，皆所不取，以为非“二十世纪之活字”。……夫文字革新须洗去旧日腔套，务去陈言，固矣。然此非尽屏古人所用之字，而另以俗语白话代之之谓也。……足下以俗语白话为向来文学上不用之字，骤以入文，似觉新奇而美，实则无永久价值。因其未经美术家锻炼，徒诿诸愚夫愚妇无美术观念者之口，历世相传愈趋愈下，鄙俚乃不可言。足下得之，乃矜矜自喜，炫为创获，异矣。如足下之言，则人间才智，选择，教育，诸事皆无足算，而村农伧父皆足为诗人美术家矣。甚至非洲黑蛮，南洋土人，其言文无分者，最有诗人美术家之资格矣。

至于无所谓“活文学”，亦与足下前此言之。……文字者，世界上最守旧之物也。……足下乃视改革文字如是之易乎？……

覲庄这封信不但完全误解我的主张，并且说了一些没有道理的话，故我做了一首一千多字的白话游戏诗答他。这首诗虽是游戏诗，也有几段庄重的议论。如第二段说：

文字没有雅俗，却有死活可道。

古人叫做欲，今人叫做要，

古人叫做至，今人叫做到，

古人叫做溺，今人叫做尿，

本来同是一字，声音少许变了。

并无雅俗可言，何必纷纷胡闹。

至于古人叫字，今人叫号，古人悬梁，今人上吊，

古名虽未必不佳，今名又何尝不妙？
至于古人乘舆，今人坐轿；古人加冠束帻，今人但知戴
帽；
若必叫帽作巾，叫轿作舆，岂非张冠李戴，认虎作
豹？……

又如第五段说：

今我苦口饶舌，算来却是为何？
正要求今日的文学大家，
把那些活泼泼的白话，拿来锻炼，拿来琢磨，拿来作文
演说作曲作歌：——

出几个白话的嚣俄，和几个白话的东坡，
那不是“活文学”是什么？
那不是“活文学”是什么？

这一段全是后来用白话作实地试验的意思。

这首白话游戏诗是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做的，一半是朋友
游戏，一半是有意试做白话诗。不料梅任两位都大不以为然。
靓庄来信大骂我，他说：

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，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人之命
者。足下诚豪健哉！盖今之西洋诗界，若足下之张革
命旗者，亦数见不鲜。最著者有所谓Futurism, Im-
agism, Free Verse, 及各种decadent movements
in Literature and in arts。大约皆足下俗话诗
之流亚，皆喜以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”自豪；皆喜诡
立名字，号召徒众，以炫骇世人之耳目，而已则从中

得名士头衔以去焉。……

信尾又有两段添入的话：

文章体裁不同。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，诗文则不可。

今之欧美狂澜横流，所谓“新潮流”“新潮流”者，耳已闻之熟矣。诚望足下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也。（七月二十四日）

这封信颇使我不心服，因为我主张的文学革命，只是就中国今日文学的现状立论；和欧美的文学新潮流并没有关系；有时借镜于西洋文学史，也不过举出三四百年前欧洲各国产生“国语的文学”的历史，因为中国今日国语文学的需要很象欧洲当日的情形，我们研究他们的成绩，也许使我们减少一点守旧性，增添一点勇气。觑庄硬派一个“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”的罪名，我如何能心服呢？

叔永来信说：

足下此次试验之结果，乃完全失败是也。……要之，白话自有白话用处（如作小说演说等），然不能用之于诗。如凡白话皆可为诗，则吾国之京调高腔何一非诗？……呜呼！适之吾人今日言文学革命，乃诚见今日文学有不可不改革之处，非特文言白话之争而已。吾尝默省吾国今日文学界，即以诗论，其老者，如郑苏盦陈伯严辈，其人头脑已死，只可让其与古人同朽腐。其幼者，如南社一流人，淫滥委琐，亦去文学千里而遥。旷观国内，如吾侪欲以文学自命者，舍自倡一种高美芳洁之文学，更无吾侪厕身之地。以足

下高才有为，何为舍大道不由，而必旁逸斜出，植美卉于荆棘之中哉？……唯以此（白话）作诗，则期期以为不可。……今且假令足下之文学革命成功，将令吾国作诗者皆高腔京调，而陶谢李杜之流将永不复见于神州，则足下之功又何若哉？……

（七月二十四夜）

觐庄说，“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，诗文则不可。”叔永说，“白话自有白话用处（如作小说演说等），然不能用之于诗”，这是我最不承认的。我答叔永信中说：

……白话入诗，古人用之者多矣。（此下举放翁诗及山谷稼轩词为例。）……总之，白话之能不能作诗，此一问题全待吾辈解决。解决之法，不在乞怜古人，谓古之所无，今必不可有，而在吾辈实地试验。一次“完全失败”，何妨再来？若一次失败，便“期期以为不可”，此岂科学的精神所许乎？

这一段乃是我的“文学的实验主义”。我三年来所做的文学事业只不过是实行这个主义。

答叔永书很长，我且再钞一段：

……今且用足下之字句以述吾梦想中之文学革命曰：

（1）文学革命的手段：要令国中之陶谢李杜敢用白话京调高腔作诗；要令国中之陶谢李杜皆能用白话京调高腔作诗。

（2）文学革命的目的：要令白话京调高腔之中产出几许陶谢李杜。

(3) 今日决用不着“陶谢李杜”的陶谢李杜。若陶谢李杜生于今日仍作陶谢李杜当日之诗，则决不能更有当日的价值与影响。何也？时代不同也？

(4) 吾辈生于今日，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的《五经》、两汉、六朝、八家文字，不如作家喻户晓的《水浒》、《西游》文字。与其作似陶似谢似李似杜的诗，不如作不似陶谢不似李杜的白话诗。与其作一个学这个学那个的郑苏盦陈伯严，不如作一个实地试验，“旁逸斜出”“舍大道而弗由”的胡适之。

……吾志决矣，吾自此以后，不更作文言诗词。……

(七月二十六日)

这是第一次宣言不做文言诗词。过了几天，我再答叔永道：

……古人说，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”。文字者，文学之器也。我私心以为文言决不足为吾国将来文学之利器。施耐庵、曹雪芹诸人已实地证明作小说之利器在于白话。今尚需人实地试验白话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耳。……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，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。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，实地练习之。倘数年之后，竟能用文言白话作文作诗，无不随心所欲，岂非一大快事？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，颇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。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，不能多得同志，结伴同行。然吾去志已决。公等假我数年之期。倘此新国尽是沙碛不毛之地，则我或终归老于“文言诗国”亦未可知。倘幸而有成，则辟除荆棘之后，当开放门